

明代赠序文创作的应用诉求与夸饰规避

刘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赠序文是唐宋以来最为流行的实用文体, 既有着士人们相对明确的写作目的, 又隐含着相当复杂的创作心态。为冲淡赠序文行文过程中称颂、夸饰言辞的功利性、虚饰性, 明代文人尝试过以强调文体内涵为夸饰正名、借历史空间感弱化夸饰、反复强调真挚情感、褒奖夸饰同时言其不足、变赠序文为讲学录等文学手段。从这五种行文手段的分析着手, 结合其创作心态和写作目的, 可以明确赠序文创作过程中文过饰非的现象与文人书写责任感之间的抵牾, 以及书写者通过立论倾向的调整和立论材料的选择来淡化二者之间矛盾的尝试。

关键词: 赠序文; 应用书写; 规避夸饰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5-0132-06

郭英德先生指出, 中国古代文体是“由行为方式向文体方式的变迁, 文体分类的社会特征深深地蕴藏于文体的文本方式之中”^{[1](3)}。行为方式决定了文体功能, 反过来, 不同的文体功能也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 起到强化行为习惯、并使行为普泛化的作用。序体文分书序、赠序、寿序、族谱序等, 其中赠序文是明代作家别集中最常见也最具实用特征的一种文体, 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写赠序文。^[2]赠序文在明代别集中出现的频率, 昭示着这一文体在士人政治、交际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明代的赠序文创作甚至已经形成相当可观的市场, 有不少文人写赠序文为博润笔费^{[3](36)}, 可以想见赠序文在明代社会交际中的认可程度和风靡状况, 正如吴讷在《文章辨体》中所云“近世应用, 惟赠序为盛”^{[4](42)}。

赠序文的溯源, 可以追至先秦时期的散体赠言, 而赠序文的文体内涵被固定则最早见于唐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首次确立作为体类的赠序文, 并云:“唐初赠人, 始以序名, 作者甚众。”^{[5](7)}唐宋两代(尤其是中唐之后)赠序文佳作不乏, 并特重文采, 或以华文妙辞铺排场景, 或用散体抒发世理人情。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都有赠序名篇传世, 而赠序名篇无不文采析理并重, 又寄寓深情。林纾曾指韩愈的赠序为“绝技”, 且“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6]。然而, 自唐宋赠序文成熟以来, 尽管历代作者风格迥异, 表露才情不一, 但除却文章才华鲜为文体实用功能所拘的文章大家若韩柳辈之外, 大部分赠序文围绕的核心

主旨不外乎二: 一为叙情, 追溯渲染双方交往情谊来强化人际脉络; 二为称勉, 夸颂勉励对方人格、际遇从而强化人际关系。显然,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 文章本身常要服务于赠序文的应用诉求, 真情流露便渐渐演变为谄谀和夸饰。及至明代, 赠序写作的焦点已远非唐宋时诗意化的情境展示和情谊, 不仅赠序文流传数量和虚饰状况均远超唐宋, 甚至有不少赠序沿袭谄谀套词, 已经到了掩去赠送人名后莫辨所言为谁的程度, 所谓“千里赠言, 一面未卜, 虽赞叹之语满堂, 祝颂之章充栋, 举其事而质之主人, 主人不受; 掩其姓名以示邻里, 邻里亦不知为何许人也”^{[7](2951)}。朱国桢曾言及明人赠序文写作状况:“近日文字中间为上官而作, 如考满入觐, 贺寿差送, 连篇累牍, 有一而至二三首者, 非不美观, 然套语谄辞若出一辙, 其于文格益靡且远。”^{[8](卷十六)}明代文人对赠序文的这种流弊可谓深恶痛绝, 认为既伤文格, 亦败人格, 批评的言辞不一而足。

虚伪和阿谀的行为显然违背了文人“修辞立其诚”的创作初衷和文化品格, 正如明人欧阳德所说:“议不达于事, 文不根于情, 如无赠耳。”^[9]陈仁锡对赠序文谄媚流弊的批判更加激烈:

性不工诗, 代又不屑, 尤厌作序, 未有王唐时文, 秦汉古文, 而须题端者也。如其不尔, 誉言何益? 噫! 士固有耻, 贺秩、献寿、碑德, 其文谄。滥缘疏, 侈荐牍, 其文乞。乞与谄, 文之下也, 弗为之矣。^[10]

理想中的赠序文应当具备发乎至诚、情真意切、

收稿日期: 2016-02-10; 修回日期: 2016-08-10

基金项目: 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序跋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A14)

作者简介: 刘洋(1989-), 女, 山西大同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元明清文学

不谄无乞、正直无私的品格，如同儒家对君子的人格要求一般无二。但困于现实生存方式和政治需求，赠序文的应用主旨和交际功能亦无法割舍。如此一来，一方面是强化人际、酬答仰慕、彰显自我的写作目的，另一方面则是阿谀夸饰的文辞与书写活动神圣感之间的矛盾。为平复士人身份夹杂在二者之间羞愧依违的心态，解决或者弱化这种抵牾势在必行。唐宋以降，文人们为缓和赠序文应用诉求和文人身份之间的龃龉，不厌其烦地变换诸般写作技巧，于赠序文中重复这两大宗旨的同时，亦试图通过结构、修辞等文学手段来冲淡行文过程中表彰、称颂的功利性和虚饰性，而明人尤甚。

明代文人所施用的具体行文手段种类繁多，概括而言，使用频率较高的行文结构及表述方式有五种：①追溯赠序文文体内涵，为称勉行为正名；②引古人古事将今同昔比，借助历史空间感弱化夸饰；③反复强调感情的诚挚程度，证明作者本人真情不伪；④褒奖夸饰的同时稍涉及其不足，端正文章立场，进而彰显作者品格；⑤摒弃直接叙旧称勉，代之以讲学笔记，间接将求序初衷置换为立言。与明以前赠序文写作相校，以较明确的文体意识来追溯文体内涵、用理化学化的讲学笔记作为文章主体这两种方式又是较为显著的明人特色。固然，诸般行文技巧无法完全消除赠序文文体和应用者共同建构的慕名求利内涵，甚至有欲盖弥彰之时，但士人对赠序文文体结构加以拓展的动机、操作方式却颇具研究价值。

一、引文体规定为夸饰正名

竭力摆脱夸饰嫌疑、抹去谄谀面貌是赠序文书写过程中常见的写作诉求，通过引述赠序文固有的文体内涵来为称勉正名，便是常见的结构技巧之一。赠序文并非罕见文体，其应用之广毋庸置疑，在正文中花费篇幅来讲述、强调文体内涵本无必要，但在赠序文中大量出现这种笔法和现象，其背后的创作心理，或是无奈为之的心态流露，或是借此洗刷谄谀的期待诉求。

徐有贞的《送许明逵序》一文写到作序缘由时，充分肯定赠序文称颂的必要性，讲明称人之长乃君子扬善的正当行为，为接下来要夸饰的内容正名。作者在开篇即称：“扬人之善而不没者，君子也，子无我辞。理既受仲京之诤，以仲京之所善，亦吾父之所善，而理又素重其人，叙其事也。”^[11]随即在序文正文中历数“朋友道废”的种种现象，如“及夫见小利辄趋，

小害辄避，岂惟怱然如不相识，甚则忌其荣，幸其辱，面亲而背疏，毫发拂其意欲，则反为仇讐”等反面现象，用来衬托如主人公般好义者实在弥足珍贵，文末声明“不能张其事，抑犹足以愧夫市交者”，再次申明自己在文章内扬善称美的必要，否则便有愧于友，有愧于心。进一步讲，在赠序文中以言写“慕恋”，“致殷勤之意”，不仅是君子仁人所当为，也是“凡有情者皆然”，如王直《赠胡克宁归毗陵序》一文中所称：

后之君子乃谓“仁者赠人以言”，夫岂必仁者哉？苟笃于相好而遽欲相别，所以写慕恋之怀，致殷勤之意，勉其德，励其行，或相规于正，相期于久，必因言以发之。凡有情者皆然也，岂独仁者而后然哉？^[12]

有了这样的铺垫，赠别序中勉德励行的行为便显得发乎情之自然，非独谄谀一词所能涵盖，夸饰的意味便有所淡化。此外，对赠序文文体功能的强调有时也以反面论证的形式出现。吴仕在《赠马还初邑侯入覲文》^[13](卷四)中先谈赠序文本是“拳拳之意”的表达载体，而实际上，赠序文的创作在“来去庆贺之际”多是“貌言耀耳目”“亦得免汎滥之诮”；在正文里，主要评述马侯“仁心为质，义干独特”的系列事迹，末尾以强烈的语气和指天发誓的口吻来强调所言的真实性，所谓“凡此数语，自谓颇得情实，可质神明”。由此而观之，吴仕本人在序文创作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序文内容可能引发的怀疑，揣摩到读者会有的反应，因此在书写过程中，先说明赠序文中夸饰谄谀之流弊与文体功能相悖，表达自己的憎恶，随即在不得不评述马侯才干之后，又竭力于文末解释、申诉自己文章内容的可信度。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运用赠序文的文体内涵，都是作者创作心态中不自信的流露，因为心虚所以需要辩解、掩饰。这种心态上的不自信，既针对文体本身，也针对自我表述。作者料想到被怀疑指责的可能，便将赠序文的文体功能请上前来，通过肯定君子扬善的人格要求和临别赠言的文体需要，或者通过纠正文体流弊的呼声，以至于通过指天为誓的方式来为赠序文内容的客观性佐证，种种极力表露消除误会的意图，又不免有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

二、借历史空间感弱化夸饰

议论是赠序文的主要表达方式，绝大多数赠序文都以议论开始。在议论的部分，作者往往会以自身丰厚的知识积淀，在散文文体习惯和行文风格要求之下，引入较为宏大的议论主题，如士不遇、治乱、士人身

份与责任感等等。这种行文手法旨在拓宽赠序文的表现范围,提升文章主题高度,又使作序人达到逞才扬己的目的,又起到了分散焦点、弱化夸饰行为的作用。

“士不遇”是赠序文中的常见论题。林希元的《榕溪赠别序》是一篇为学生叶伯龙所作的赠序文。文章首先就“今世取人之弊”大发议论,开篇即谓“帝王之致治在求贤,帝王之求贤在立法,法之善否而治乱因之,故法不可不慎也。”进而用大量篇幅论述自周迄今的取人之法,篇末归结到赠别对象的品质才情身上,言学生叶伯龙“其为人端良朴茂,悦亲信友,乡评素重。其文皆由中而发,凿凿乎仁义躬行,实非空言者”^{[14](卷九)}。如此一来,围绕“士不遇”这一极具历史感之话题的讨论占据了序文的大部分篇幅,文章末尾仅以寥寥几笔嵌入对叶伯龙的褒奖勉励,顺利转移了称勉的分量,同时提升了文章深度和品格。当然,这种写法与作序和求序者之间的关系身份有关,师长对晚辈的赠序行为一般不涉及有求于人或者期待强化交际的需求,采取这种行文方式亦是二者现实身份的直接反映。同样的行文模式再如徐有贞的《送翁孟学序》一文。该文亦以“士患无可,不患无用之者”开篇,随即引出“有猷有为有守者遇于时,固足以经纶国家之事,而不遇亦不失为贤也”的核心观点,以勉励“秀爽负奇气,哀然材且良,盖所谓豫章千里之匹”的主人公“句曲翁君孟学”^[11]。

与送别序相较,赠序中的贺序(或庆贺升迁或勉励考绩),更加直接自觉切入政治及人际交往需求的主题中,更加紧急地关联到仕宦起伏、荣辱恩怨,因此更容易产生称颂功绩或嘉赞声名的言辞。为避免太过于显露直白的夸颂,士人们亦用到借古之治乱起兴的方式,转移重点,进而将称颂自然融合到历史主题中,借助历史资源的重量和深度来弱化夸饰力度。如费宏的《送贵溪令韦君述职赴京师序》一文,把对友人进京述职的期许置于观民风以知治乱的论题中,先追述有史以来由风谣知治政的典故,将文章主人公韦君行迹同“古今论治者之所尚”并提,说明韦君所为“不可废”,进而从儒家政教之历史传统的角度来肯定其重要性:

入周而闻缁衣之什,则知郑伯之政;入鲁而闻章甫之诵,则知夫子之政;入渔阳而闻两岐之歌,入蜀郡而闻五袴之谣,则知张湛廉范之政。盖纳言以观治忽,采诗以观民风,听谣诵以审哀乐,乃古今论治者之所尚,不可废也。^[15]

在起兴之后,费宏该文直接切入正题,开始大肆褒奖韦君的才干,赞其为人和行政才干如“慈祥恺悌,有视民如子之心,忠信明决,有听断如流之才;而其

为政也,守之以正,将之以诚,催科之中抚字存焉,刑罚之中教化寓焉”。除了祖述称颂对象职责才干的合理传统,亦有运用反面衬托的方式来突出称颂对象的才能者,如林弼《唐君大年综政龙溪序》:

予尝论为政者通而不偏,难乎其人。盖柔巽之士或任重之无力,刚严之士或惠下之寡恩,敏辩集事者患在持守之不固,宽厚少文者虑乎施設之不周。斯全材之难得,诚古今之交病也。若唐君大年,予所谓不偏者,其殆庶乎!^[16]

此文先论历来为政者或怀才却不能治政者的种种不足,再写称颂对象既绝诸弊,且集众好,凸显这份珍贵和难得。议论部分的书写采用对比的方式,站在历史空间的高度,发出“为政者通而不偏,难乎其人”之论,其有效性很容易引发读者共鸣,随后将唐君大年,即求序人的事迹身份置于话题之后,借助被突出的主论点,及主论点所关联的庞大历史空间来转移主题,淡化夸饰痕迹。

三、反复强调真挚情感

历来赠序文中,真情流露最多的要数别序,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交通条件和医疗状况的限制,使得古人的每次长离都有可能是此生永别,因此古人向来有重离别的传统。离别时珍重之情和祝祷之愿须有寄托,以为纪念、怀念、追思之用,诗文便承担起这项社会功能。因离别的场面写出的诗文不乏溢满真情的名篇佳作,如“舟凝滞于水滨,车透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诘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17](346)}等等,传唱千古,沉吟反复,其审美效果已具备穿越时空打动人的价值。在明代,赠序文亦是送别必备的礼仪形式之一:“凡人有远行,相与者必有礼以送之。台聘氏、于宣父以言,宋人于邹轲以金,武于松陵有诗,愈于愿有文,假财将敬,用辞寓情,所予虽殊,为礼则一而已矣。”^{[18](卷一)}

从内容和创作风格来看,如果说在诗歌重抒情的文体内在规定性已经点染、倾诉出太多被诗意包裹的断肠柔情或者拳拳劝勉,那么作为散文的文体功能与内涵构造出的别序文,则相对弱化了情感和情绪的成分,代之铺展开理性、实效所要求的人情往来和道义论说。送别时的真情流露在赠别序中,换上散文的形式,在相应创作心态的驱使下,便表现出鲜明的叙情倾向,通过论证作序者与写序对象之间情义往来的实在性,反复强调双方交谊情感的真挚程度,进而暗示序文内容夸饰成分是为合理存在。

落实到赠序文本的实际书写，在强化交际的文人创作心态驱使下，直奔劝勉或感情主题，成为所有别序文的主要内容。直接表露、突出嘉许之意来掩盖求序人困厄处境的书写手法，在别序文写作中屡见不鲜。黎贞的《厓门送别序》用对答论辩的形式论述自己与陈参之间的交谊，先驳斥缱绻别离之意不足为“抱四方之志”的君子所惜的观点，随后引出与别序相关的“人之至情”，即借履常之口道出“予言壮则壮矣，然非人之至情也。人之情有亲疏之等，有厚薄之施。是皆本乎诚，非沾矫勉强之谓也”，并以韩愈同僧人大颠、司马光同范镇之交为例，将自己的交际行为嵌入其中，渲染情真意挚的场面。

昌黎韩子攘斥异端，不少假借，犹与大颠师临别情，恋恋不忍舍，矧予与公意气相求，亲爱过骨肉。公姑苏人，去吾郡三千余里，南来广海与舂峒又仅二十里，每樽酒相过，必雅歌投壶，援琴作《倚兰操》。会数而礼勤，意厚而情笃，越六载如一日。昔司马君实与范景仁契好甚笃，常曰：“吾与景仁如兄弟也，但异姓尔。”每誓曰：“生同志，死同传。”

上文通过描写，已经流露出对“生同志，死同传”的诚挚情谊的欣羨和诉求，继而将分别时刻的真情流露视为至诚、至情的外露，在赋予别序文合理性的同时又起到强化了序文文体意义的作用。

今予不揆卑陋，托契于公，感公之知，仰公之德。出于肺腑，如鱼水胶漆，本于至诚。今当远别，虽不戚戚作儿女态，而悒悒之忱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乃人之至情也，子奚予诮？^{[19](卷五)}

“子奚予诮”的反问是论述的终结，也是淡化夸饰主题意味的最后表露。在赠序文中用紧凑的节奏甚至引经据典来论证往来情义的行文方式，往往能取得令见者流涕、闻者动心的效果。真情诚谊虽是理想的赠序典范，但文人笔法的过分渲染，加上赠序文本本身的性质和功用便注定其在传播过程中会被士人作为交际工具，在攀附、应和、结党等实际需求和心态支配之下染上谄谀不实的弊病。但是，士人耳濡目染的儒家典范人格和作为君子的身份标识约束着他们为文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具备至诚敦厚的人格，或者起码自觉以具备这种品质的君子自居。现实运作和理想人格的矛盾积聚于赠序文中，赠序文作者以感情的辩解和强调来表达诚挚之情，便是解决二者抵牾的方式之一。

四、褒奖夸饰同时言其不足

在儒家正统理念中，对人物的评价向来有褒贬分

明、诚挚客观的内在规定。自先秦儒家的君子小人之别奠定稳固的话语系统开始，历代士人口中，君子小人之间界限简单而清晰，以行为方式来断言君子小人，更是常用于义气之争或攻讦政斗的言语手段。儒家人格区分的简单模式亦成为祛除赠序文流弊的资源，基于此，明代序作者们最直接的行文内容便是执行儒家的品评标准，即诗文创传统精神——美刺并举，既肯定主人公的才干，亦指出主人公的不足。郑真在《跋程羽肃行卷》中谈到：

君子赠人以言，所贵于言者，以其有所劝勉警厉，益于人耳。……翰长宋公既为文以赠，而孙代仲衍、蔡氏宗默皆本其出处，诗歌叙述，不以颂而以规，所以为善言也。^{[21](卷三十九)}

徐有贞亦在《送太守况公述职序》中表达褒贬并行的意思，所谓“余窃以古之君子之相赠人以言也，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赞其所未至”^{[11](卷三)}。徐有贞在同篇序文中也确实做到了对主人公太守的劝勉，“然吾郡能言之士十百，其人极口之辞，殫笔之力称而道之，固已无遗矣，使余能言且无以加，矧其不能乎？”随后将重点转至劝勉，主旨落在劝太守能够做到朝夕惕励，不松懈，目光不能仅仅放在当下，更应高瞻远瞩，顾及来日。具体的论述内容，以“夫以公之所自立而观其志，盖不止于今日之所见者，而吾党之士所为称说乃止而弗进，岂忠告于公者哉”为起式，既表达赞许，又使得文章在诸多充溢夸颂之辞的赠序文中能够脱颖而出。随后，徐有贞对比黄霸、韩休这样青史留名之人在史书中的定论，传达循吏与相业的高下之别：

昔黄霸治郡，常为天下第一，后为丞相，乃无所建明而功名损于前时，韩休亦善治，郡人以恬和易之，及既当国，则直道匡君，有良相风。盖大臣之道与为郡异，霸明于治民而懵于丞弼，若休则可谓兼之矣。故《汉书》传霸于循吏，而《唐书》叙休之相业有以也。公之高才达识，其必有见于此者，使其果进而大任，尚愿宜以霸之，所不足者自克以休之，有为者自勉可也。

继历史人物的高下价值判断，徐有贞进一步引申，勉励太守况公立志高远，以收“唐虞三代岳牧卿尹”之功。

夫有而不自足者，必成其大，行而不自止者，必至于远。古之君子惟日孜孜求进乎道，恒若弗及，用图其远大之功业而已。余不敏，亦尝有志于斯，故喜为公道也。公于是而加孜孜焉，以求其道，则虽唐虞三代岳牧卿尹之功业而有可致，又何韩休之不可及哉！遂以是言复于侃而为公赠。

纵观徐有贞此篇序文，核心论述在于表达太守况

公虽好,却也有待更进一步,并引历史故实劝太守宜放眼长远,更上层楼。此类序文在赠序文中已属于能兼及不足者,大部分赠序文落实到具体写作时,这种美刺兼备的期待呈现出“温柔敦厚”的姿态,往往以褒奖夸饰为主,言不足时力度轻柔,凡能文饰者,则绝不揭露。赠序文本与仕宦政治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相别之日常是仕途变动之时,对升迁之喜进行恭贺,遇贬谪之人加以劝勉甚至修饰,褒扬功绩成就,掩盖尴尬困顿,描绘出一幅堂皇从容、和煦温暖的画面,是赠序文的责任和功能。以褒奖恭贺为主的赠序文屡见不鲜,如薛瑄为同僚所作《送金都御史李公升秩序》《赠知韩城李居敬序》等等大量序文中或叙述政绩、或寄以期许,皆为祝颂夸赞之语,为化解夸饰的尴尬,薛瑄自以“乐道人之善”^{[21](751)}为说辞。与薛瑄的一律夸饰和徐有贞的稍及不足相比,海瑞的赠序文,可谓是通过言其不足而去除夸饰之力度最强者。《赠顾肖坡荣奖序》^{[22](504)}中引张生之语,指顾肖坡“毫发于民无染,百应迎刃而解,庖丁新发于硎,不是过也”的功绩、长处,同时亦言肖坡“性气高急,兴筑事用法惟峻,民不可与虑始如是尔”;《赠钟从吾晋灌阳掌教序》^{[22](503)}一文开篇即称多次推辞为钟从吾(时为文昌邑司训)晋升作赠序文,而“辞之不得”,不得已为言,文章主体围绕学与仕、教职与社稷的关系展开论述,但在文章后面部分聚焦在钟从吾身上时,言其“无得于府县志秩,为铨司不知人不满”的不足。此外,海瑞还在恭贺升职的赠序文中表达警示意味,如在《赠高将军升指挥使序》^{[22](496)}一文中的话题转至主人公高前江之子时,警之曰“今高将军苟无能如绩近似其父,夫独非前江之子耶?古称父作子述,子不如其父,人以不肖子呼之”。海瑞一生执念尽忠,性刚辞烈,在受人之托撰写赠序文的过程中,对求序者并言其过,未见其过者则警示之,使得夸饰的成分立时消释。海瑞的写作方式在有明一代诸多赠序文作者中,实属罕见。

五、变赠序文为讲学录

每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内在功能和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文体与内容在书写方式、表达效果和审美内涵上有同构效果。文体类型制约文构方式,而文构方式则回应文体类型的应用需求与审美内涵。要突破业已形成的文体意识,摆脱文体惯性的制约殊非易事。用纯心无私、挚言绝欺的标准来要求应用文写作,本身便有强人所难之实,面对求序人的信任,难免要“感

公之知,仰公之德”,彰功隐过,为了酬答信任而设法称许。正如同耳濡目染的儒家道德人格标准对于大部分士人来说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信念,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实环境的所有层面。

王门后学在解决赠序文书写创作态度和应用需求之间抵牾的矛盾时多有建议。欧阳德认为只需将平日交往中能够令人受益或者赞许的言辞记录下来,将直接的人情表述换作学术道义的探讨,即“敬述平日所请于先生者,以志不忘”^[23]，“乃类平日相与讲学之言以赠”^[23]。在序文写作时,欧阳德大多在以简练言语概述作序因由之后,大讲致良知之学,探讨阳明学说,使得赠序文体式类似讲义语录。如《赠陶仲良》一文开篇即入心学命题。

诚者,性之者也。其次致曲复其性者也。性具于心,其达于纲常伦理之间,无一念不真,无一事不实,无一物不体,无一处不到,细致曲折,充周遍满,盖其本体如此。^[23]

紧随其后,文章内容囊括“大学明明德而已”、“言政者必曰才智,才智未也,致其良知,故民一身,天下一家”、“人有恒言曰,末世滋伪,夫良知之于情,伪险阻也”等七段哲学论述,如此一来,只剩下学术探讨和思想交流、传布,对求序人的褒奖和称颂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弱化。欧阳德此类序文较多,《从叔格庵先生别言》《赠徐远卿》《徐任夫赠言》《赠孟元实序》《别杨季卿序》等篇目的行文方式亦如出一辙,篇篇论理,提及作序缘由时,简短概括如“游太学归,请予教言,其友赵性甫定林……出轴请书,遂书以赠之”^{[23](卷四)}等。可以说,欧阳德赠序文写作是一个去除夸饰的形变极端——他已经代换了赠序文的传统模式,用学理沟通人情,从而去除夸饰。同样的手法还应用在其他赠序文中,如赵汭《送叶宗茂还安丰序》^{[24](卷二十)}全文未及叙述主客情谊和夸饰恭维,而是一篇规范的议论文,作者通篇用来回答叶宗茂的困惑,以“君子之为学固将以事其亲,然有急先之务焉”为论题,列举圣门学者如颜回的例子来说明君子如何在事亲与求学之间平衡取舍。

与欧阳德将赠序文的主体部分当做讲学录类似,方孝孺的赠序文亦习惯由赠序对象的话题性直接上升到理道的高度,并用主要篇幅进行议论阐释,从而将文章重心放在理事论辩,相关人事则退居一旁。其大部分赠序文开篇往往能够提升到圣贤、古今、天道等宏阔概念之高度。以《送平元亮赵士贤归省序》^{[25](465)}为例,开篇即称“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通篇四分之三篇幅皆在论文道关系,文不言道,谄媚媚时之弊,有关赠序对象牟元亮、赵士贤的

叙述只在文章末尾有短短两句，其中一句介绍作序缘由“于其归省，故与之论文”，另一句则称二人“大学之能文者也，国家将望之以复古之文”，亦入于文道之辨的话题。在行文效果上，用阐释理道的论题将文章的立意和价值落在循道以正文风的责任感上，并以作序的缘由来共勉，规避了夸饰的可能性。从学术论理的角度加以替代固然有可行性，只是受限于求序与作序人的学术关怀，且多存于师生之间，抑或倾心学术论理的心学门人之中。而赠序文多应用在仕宦交际的应答场合，因此如欧阳德这类以说理论道为主的赠序文并不多见，即便对于王守仁以及阳明后学如罗洪先、王畿等其他理学家们来说，在书写赠序文时，虽然因为理学涵养和关注焦点的不同，在书写过程中同专注诗歌文辞的文学家于气象上有所区别，但亦并未曾作欧阳德式的规避。

赠序文本本身被寄寓了“君子于惜别拳拳，以是为言，知所重也”“言之所在，道之所在”^{[26](卷五)}的儒家道义和人格伦理要求，而序文流弊的铸成是赠序文本本身的文体缺憾，亦是所有文体尤其是实用文体都会沾染的必然内涵。虽说“至爱无文，文之盛，情之衰也”^{[9](卷四)}，但实际上想要写出真挚纯粹的赠序文，其前提在于相知，且肯吐真言。且不说相知之难，即便相知，当赠序文业已泛滥成交际工具时，相知的前提也不得不放低身段，而相知且吐露真言的要求也因为赠序文的天然局限而打了折扣。徐阶《知己赠言序》中对此有很好的表述。

赠言，古也以知己名，又言之善者也。善言以为赠，赠之厚者也。厚以为赠，相知者之所愿也。虽然，人岂易相知哉！迹殊则不及知，道殊则不与知，志异则不能知。^{[27](卷一)}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士人之间来往酬答的赠序文被困于仕途关联，夸饰成为文体事实内涵的必要构成。但是也有一类属于医患关系赠序文，因求序人并非士人身份，相较于士人之间的赠序书写显得更加真实动人。如费宏的《赠医师夏君孟厚序》^[28]一文，行文亦叙事为主，记叙医师夏孟厚治愈自己到处求医未果的父亲，赞扬其高超医术，用来起兴的“医贵乎老者”充满了由衷的情感倾注，叙述中对老父病情的关切，初见治疗效果的喜悦，其情真切，颇为动人。当然，没有太多其他利益掺杂的赠序文在明代赠序文总量中所占比例是微乎其微的。为使士人发言为诚的文格和应用文酬答夸饰之间和解，明代士人们在结撰行文之时或辩解、或逃避、或正身，其中的曲折心态和创作动机既耐人寻味，可以作为考察文人交际幽微之处的佐证，也流露着赠序文作者们因为“立诚”的创作宗旨同现

实之间的龃龉而注定无法挣脱应用痕迹的无奈心绪。所以，明晰明人赠序文的创作状况、衡量明代文人们赠序文的创作水平，不仅在于揭示或比较他们去掉夸饰和谄谀的能力，更在于聚焦他们顾及交际功能的同时，文章呈现兼具洞察力与斐然文采的程度和水准。

参考文献：

- [1]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 张德建. 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 [3] 叶盛. 水东日记[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5.
- [4] 吴纳. 文章辨体序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5] 姚鼐. 古文辞类纂[M]. 王先谦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6] 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4.
- [7] 顾大韶. 赠李颀所序. 明文海[M]. 黄宗羲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8] 朱国祯. 涌幢小品[M]. 明天启二年刻本.
- [9] 欧阳德. 欧阳南野先生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81 册.
- [10] 陈仁锡. 止庵题言[C]//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 崇祯六年张一鸣刻本.
- [11] 徐有贞. 武功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12] 王直. 赠胡克宁归毗陵序[C]// 抑庵文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13] 吴仕. 顾山私稿[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70 册. 明嘉靖刻本.
- [14] 林希元. 林次崖文集[M]. 清乾隆十八年陈声诒燕堂刻本.
- [15] 费宏. 太保费文宪公摘稿[M]. 续修四库全书. 第 1331 册.
- [16] 林弼. 林登州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17] 江淹. 别赋[C]// 萧统文选卷.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18] 黄福. 送石大参考绩别图序[C]// 黄忠宣公文集. 明嘉靖冯时雍刻本.
- [19] 黎贞. 林坡先生集[M]. 清光绪元年重刻本.
- [20] 郑真. 荜阳外史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21] 薛瑄. 薛瑄全集[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 [22] 海瑞. 海瑞集[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
- [23] 欧阳德. 赠徐远卿欧阳南野先生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81 册.
- [24] 程敏政. 新安文献志[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25] 方孝孺. 逊志斋集[M]. 徐光大校点.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6.
- [26] 张弼. 张东海先生文集[M]. 正德十三年周文仪福建刻本.
- [27] 徐阶. 少湖先生文集[M]. 嘉靖三十六年宿应麟刻本.
- [28] 费宏. 费文宪公摘稿[M]. 明嘉靖刻本. (下转第 143 页)